



时间与实践

——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

Time and Praxis: An Introduction to a kind of Existentialist Meta-praxiology

黄其洪 著

时间与实践

——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

Time and Praxis: An Introduction to a kind of
Existentialist Meta-praxiology

黃其洪 著

责任编辑:孔 欢

封面设计:毛 淳 徐 晖

版式设计:周方亚

责任校对:张冉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间与实践: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黄其洪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6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01 - 016300 - 0

I . ①时… II . ①黄…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研究

IV. ①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3570 号

时间与实践

SHIJIAN YU SHIJIAN

——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

黄其洪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407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978 - 7 - 01 - 016300 - 0 定价: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最终成果（项目批准号：14FZX01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要类别之一，旨在鼓励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示范引导作用。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已基本完成且尚未出版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优秀学术成果，以资助学术专著为主，也资助少量学术价值较高的资料汇编和学术含量较高的工具书。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学术影响，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4年7月

自序

虽然在 2007 年年底我已经出版过三本介绍西方哲学经典人物思想的通俗读物，2016 年 3 月我也出版过一本讨论马克思批判性正义观的专著，但是，在我看来，即将出版的这本《时间与实践》却是我生命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代表作。经过两个多月辛苦的修改工作，在它即将付梓之前，我突然间觉得围绕着这本书有好多的话想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一本代表作凝结着他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生。平复一下激动的心绪之后，我大致将当下最想说的话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我与哲学的缘分，二是关于本书主题的确立，最后，说出我多年来一直想说但没有机会说出的谢意。下面请大家耐着性子听我一一道来。

一、我与哲学的缘分

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许是因为我是双子座吧，我从小有很活泼的一面，但是，在相当多的时间里，我喜欢独处，喜欢思索一些在同龄人看来有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大约从 8 岁那年开始，我喜欢上了看各种文学名著，中国的和西方的都看，尤其喜欢看路遥、鲁迅、德莱赛、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虽然那时对于这些作品中的深邃之处肯定没有充分的领会，但是，从这些作品中，我领悟到了一些人生的道理，也养成了对问题进行刨根问底的习惯。

1991 年，经过努力，我有幸考入了我们县最好的中学——隆昌一中。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和重要的契机。在那个年代，农村和县城的学校享受的资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就读的小学是一所偏远农村的民办小学，民办小学的学生能考上隆昌一中，在当时就算一个小小的奇迹。来到一中读书，不仅可以接受我们县最好的老师的教育，认识许多优秀的学生，最为重要的是我可以利用周末和假期到县城的五个大书店免费看各种我感兴趣的书。这些书在农村是找不到的，农村人也不会看这些书。

大约是在 1991 年的年底，我在我们县城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一本书，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哲学书，它的名字是《政治学》，作者是亚里士多德。我当时并不知道亚里士多德是谁，只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看完这本书之后，又接着找亚里士多德的别的书来看，幸运的

是,在这个书店里,居然找到了《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要知道,在一个没有大学的普通的县城,能找到这两本书,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两本书比《政治学》难得多,我当时根本没有读懂,特别是《形而上学》中的某些章节,我虽然看了很多遍,但是还是不能理解。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奇特的经历,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一门学科叫作哲学,但我隐约感觉我所读到的这几本书跟我以前读的文学名著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叙述风格方面。也许是我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性格吧,越是读不懂的书越能吸引我。1992年和1993年这两年,我花了很大精力来读亚里士多德这几本书,也做了一些读书笔记。现在回过头来看,尽管我很努力,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多少。但是这件事却激发了我对类似书籍的阅读兴趣,我与哲学的最初结缘应该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上大学之前,我已经看过亚里士多德、尼采、叔本华、罗素、卢梭、弗洛姆、阿德勒、荣格和弗洛伊德等人的部分作品。虽然那时完全是瞎看瞎撞,没有任何的系统性,也没有真正读懂,但这些人名和他们的著作却已经比较熟悉。大约到了1995年,我已经能够区分哲学作品和文学作品了。1998年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吉林大学是我第一志愿的学校,而哲学是我第一志愿的专业。我很幸运,能够成为吉林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

如果说我与哲学最初的缘分完全是一种偶遇,一种不自觉地追寻的话,那么,当我来到吉林大学哲学系求学,在各位老师的引导下进行专业化的学习之后,这种缘分已经开始深入我的血液,变成一种必然性的宿命。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我的家庭发生了一场很大的变故:我的父亲因为生意失败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不仅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还欠下大笔的债务。家里的房子因为还不起债而被充公,父母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在外地漂泊。我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支持,只能一边勤工俭学,一边继续读书。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学别的专业,或者选择尽快出来工作。坦率地说,我也曾经犹豫过,也碰到过一些好的机会,但是,最终我没有放弃哲学,从1998年一直坚持到2007年,从哲学本科一直读到哲学博士。

是什么东西给我如此巨大的力量,让我在贫困中能够一直坚持学习哲学呢?我想除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之外,还跟吉大诸位老师的引导和示范有关。吉林大学哲学系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摇篮之一,在这里已经成长起至少五代哲学学者,他们散落在中国各大高校,在哲学的许多领域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领域,不同时代的吉大学者总是成为各自时代的佼佼者。

在我求学吉大的时候,舒炜光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但是,我们总能听到

有关他的传说。邹化政老师也已经退休,但是,在我们的课堂上总能听到他的观点、著作和有趣的故事。在我的心目中,邹老师是一位对哲学十分执着、性格非常单纯可爱的老人。高清海先生给我们上过两次课,一次两节,我还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本科毕业的时候,是高先生给我们颁发的毕业证书,我还存有和他的合影。除了这一代老师对我的“历史流传物”意义上的影响外,孙正聿老师、孙利天老师、王天成老师、姚大志老师、高文新老师、刘连朋老师、马天俊老师和韩志伟老师对我的直接影响深入骨髓。正聿师那集思辨与趣味于一体的讲课方式,他对经典文本的倒背如流,他的激情的理智与理智的激情的结合,在我本科前两年深深地吸引了我。据我的同学说,我那两年说话的方式和语气不自觉地带有一种“正聿味”。正聿师是中国最好的专业哲学启蒙老师,他的课能够让不爱哲学的人瞬间爱上哲学,对哲学动摇的人不再动摇,他会让你感觉献身于哲学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文新师的希腊哲学课让我感觉到希腊哲学的美丽,这一点在那个时代是很罕见的^①。大志师的现代西方哲学课不仅开阔了我的眼见,还给我示范了一种严谨地做学问的方式。连朋师以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给我们讲授现代中国哲学课,让我对中国古典哲学和现代新儒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天俊师的讲课是非常有味道的,我听过他两个学期的课,他把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有趣的故事里,使哲学概念更加情境化和修辞化,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在我本科时期听过课的老师中还有一位必须提到,那就是王天成老师。王老师是东北头号黑格尔专家,他在气质上很契合黑格尔,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经典文本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我真正进入黑格尔的世界是在听了王老师的课之后完成的(尽管从1998年我就开始读黑格尔,但是一直没有进入黑格尔的世界)。从大三开始,其他的课我已经很少听了,但是王老师的

^① 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不仅在“文革”中被中断,在整个的20世纪后20年也被中断,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学界是存在主义、意志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的天下。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存在主义、意志主义早已经消退,但是现象学和解释学依然很火,与此同时,英美的政治哲学和分析哲学开始在这十年流行开来。希腊哲学研究真正重新兴盛起来是在2009年之后。2009年和2010年在《世界哲学》这个中国最受关注的西方哲学研究杂志上终于出现了希腊哲学研究专栏,2011年《世界哲学》甚至在第2期出了一期希腊哲学研究专号,这个专号整整花了320页来刊发国内希腊哲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这恰好是同年的其他各期的两倍。从此以后,《世界哲学》几乎每年都会出几期希腊哲学研究专栏。这些后09时代的研究,除了学术性很强之外,哲学味也很足,再也没有当年我们读希腊哲学方面的文献时那种教条化、常识化和历史叙事化的味道了。总之,在我本科阶段(1998—2002)读到的研究希腊哲学的论著,几乎就没有一个让我感觉有哲学味。但是文新师的希腊哲学课却改变了我的这种看法,所以,我说在那个时代尤为难得。

课我百听不厌,到了2003年前后,我的同学说我说话怎么变得有点“天成味”了。王老师对我的影响至今犹在。我对黑格尔的热情确实是由王老师点燃的。韩志伟老师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康德和黑格尔,我也经常到他家吃饭,他和倪娜老师都做得一手好菜。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朋友,张以明博士,我们三人当时组成了一个有趣的哲学小组。跟他们的交往既促进了我在哲学上的成长,也为我显得有些单调和苦涩的本科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2002年9月,我成为利天师门下一名硕士生,从此开始了我在孙门五年的研究生生活。利天师对现代西方哲学诸流派都有深入的研究,他视野开阔,思维严谨,有一种睿智而空灵的哲学悟性。每一次和他聊天,我都能得到很多启发。老师和师母对我生活上也有很多照顾,他们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2005年我结婚的时候,老师代表我的家长给我们送上了史上最有哲学味的新婚祝福。我们师门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也亲如一家,相互支持,相互照应。在孙门,我体会到一种超越专业的生命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的意义。正是这些美丽的故事,富有魅力的授课和有人情味的交往强化了我对哲学的兴趣,从而坚定了我以哲学为业的志向。

2007年7月,我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工作,开始成为一名哲学教师,哲学变成了我的职业,我与哲学的缘分还在继续,也许会延续到我生命的尽头。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我有幸碰到了一些学问上严谨,做人上谦逊的前辈和同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不仅包括做学问的态度,做哲学的方法,还包括为人处世的境界。除此之外,我还有幸同一批对哲学怀有深爱的同学交往,同他们讨论黑格尔、马克思和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原著,达到了教学相长,寓教于乐的状态,也收获了与他们之间亦师亦友的友谊。在这几年之内,我对博士论文做了两次修订,使其内容不断深化,其形式不断完善,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2014年我以这本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为基本材料,成功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15年3月,我来到了美国华盛顿访学,在访学期间,我接触了大量与此书有关的英文文献,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消化这些文献,在华盛顿,我对此书进行了最后一次修订,将我阅读的这些英文文献应用到此书之中,以它们来印证我在书中的核心观点,使这本书具有了更加宽广的国际视野。

我自己很清楚,此书的主题和核心的观点只是代表了我哲学研究发展的一个阶段,即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阶段。实际上,尽管2007年之后,我对此书做了反复的修订,使其观点不断深化和拓展,但是就我主要的哲学研究的兴趣和主题来说,2007年之后,我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而重新

回复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阶段,甚至在2012年之后,已经自觉地开始为自己的“拯救三部曲”而做理论上的努力,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此书主要标志的是我的学生时代的学术成就。可能是因为它凝结了我太多的迷惘、痛苦、兴奋和喜悦,我才不得不反复把它作为一个历史的纪念品来打磨和雕琢,我希望我的这个代表那个时代的思想结晶的著作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达到更加完善的程度。那么,本书的主题是如何确立的呢?

二、本书主题的确立

在本科阶段,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自由宽松的学习氛围的熏陶之下,在老师和学长的引导之下,我完全是听从自己的兴趣,先后涉猎了许多哲学人物,比如西方古代的柏拉图、德谟克利特、西塞罗、普罗提诺和马可·奥列留,中世纪的艾克哈特和奥古斯汀,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休谟、莱布尼茨和洛克,德国古典时期的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当然,在这些人物中我用功最勤的还是康德和黑格尔。在本科毕业之前,蓝公武版的《纯粹理性批判》我已经看完了三遍,而贺麟版的《小逻辑》也至少读过四遍。我尽量把当时能够见到的有关康德和黑格尔的书都收集齐全。在读别的经典作家的时候,我尽量让他们与康德和黑格尔对话,我总是做这样的尝试:试想这些经典人物提到的话题如果是康德和黑格尔,他们会怎么想。另外,曾经一度想看看克尔恺廓尔,但是,可能是当时译本质量不好,我翻了几页克尔恺廓尔的原著,觉得味同嚼蜡,很快就放弃了。现在看来是一个憾事。除了西方哲学家之外,在连朋师的影响下,我对中国古代的孔子、孟子、庄子和王阳明有所涉猎,对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马一浮、牟宗三、杜维明和刘述先也有所旁涉。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讨论死亡问题的。在写本科毕业论文之前,正律师的《超越意识》、利天师的《死亡意识》、贺来师的《宽容意识》以及程亚林老师的《悲剧意识》这四本书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死亡意识》一书不仅让我初次接触到海德格尔的思想,而且基本确定了我的本科毕业论文的思路。我的那篇近七万字的本科毕业论文是对我本科四年最关心的哲学话题的一次总结。利天师是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我与他的缘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200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阅读尼采和叔本华,尼采一度让我很振奋,叔本华又让我悲观起来。但是他们二人都让我体会到了现代西方哲学与黑格尔的巨大差异,这个事件成为我后来由黑格尔转向海德格尔的一个导火索。2003年以后,受利天师的影响,我开始关注英美分析哲学传统,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粗浅地读了维特根斯坦、罗素、弗雷格、卡尔纳普、石里

克、卡尔·波普尔、纽拉特、赖欣巴哈、拉卡托斯、库恩等人的代表作，也读了Quine和理查·罗蒂的部分作品，其中对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和波普尔三人用功较勤，围绕着这些人做了五篇小论文，后来都发表在正式的刊物上。进入2004年之后，我又对政治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罗尔斯为中心，我相继看了德沃金、诺齐克、麦金泰尔、查尔斯·泰勒和桑德尔等人的作品，曾经一度想做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但一方面这与我的专业有些不符，纯粹的政治哲学方面的论文似乎更应该在西方哲学的博士点做，我读的是马哲专业；另一方面我对英美的这一脉缺乏一种切己的认同，总觉得他们身上少了一些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到了2004年的下半年，我就把目光从英美这一线转向了现代欧陆哲学。我先后对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和保罗·利科下了一些功夫，其中特别是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我几乎把当时能够收集到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作品的中文译本通读过，尤其是海德格尔的作品我反复地看，反复地体会，有的篇章还反复地吟读，有一段时间到了言必称海德格尔的程度。那段时间，我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无限性立场都产生了怀疑，我认为站在个体性和有限性立场上的横向超越比站在总体性和无限性立场上的纵向超越是更真实的超越，也是更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一种超越方式。我从黑格尔走向了海德格尔，大约从2005年冬天开始，我自认为自己是海德格尔的信徒了。当然，即使是这样，黑格尔也依然是我经常对话的伙伴^①。

① 2007年8月底我开始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登台授课，既为本科生开课，也为研究生开课。华科哲学系上课很自由，没有指定的教材，教师可以结合当下自己的研究来上课。在一定程度上，上课的同时也就是在研究，近几年我有好几篇文章就是由学生所做的我的上课笔记整理而出的。当时华科哲学系有一种轻视黑格尔的氛围，他们的主流是康德和现象学，没有人专门讲黑格尔。我觉得很奇怪，这与吉大哲学系的氛围形成鲜明对比。也许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考虑，我从2007年开始就一直在讲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三书，也曾经讲过一年的《精神现象学》。通过这种句读式的讲解，我深化了对黑格尔的理解，我逐渐发现海德格尔的思路固然很好，但是却解决不了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要超越现代性还需要到黑格尔那里去寻找资源。大约到了2009年冬天，我的哲学立场从海德格尔又回到了黑格尔，成为一名坚定的黑格尔主义者。也正是在2009年的12月，邓晓芒老师加盟华科哲学系，从2010年的春节学期开始，他在华科讲授《精神现象学》，从此以后，华科哲学系变成了国内黑格尔研究的一个重镇。近几年，在邓老师和我的努力下，华科的学生中很多人变成了黑格尔的信徒，我相信在若干年后，这批学生中的一些人会成为国内研究黑格尔哲学的精英。这是后话。现在我想强调的是：《时间与实践》代表的是我的海德格尔阶段的思想成果，今后几年将要陆续出版的《黑格尔〈小逻辑〉导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长篇序言导读》《黑格尔〈历史哲学〉导读》《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等著作是我的黑格尔阶段的作品，而真正代表我自己独创性的成果将是《拯救概念》《拯救实体》和《拯救国家》三部曲。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我必须按时毕业,为此必须写一篇博士论文,这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反思和整理自己十多年学习和思考哲学的心得的机会。由于博士论文必须要有明确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因此,我准备博士论文的第一件难事就是选择怎样一个题目使它既具有学术价值和前沿性,又能够将我十几年的阅读和思考的成果体现出来。从2005年的7月我就开始琢磨这事,考虑到我的专业是马哲,论文的选题怎么也要和马哲有点关联。我当时对国内马哲界正在做什么工作不是太了解,也不是太感兴趣,怎么把黑格尔、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关联起来,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成为一件难事。我可能受了当时学界崇尚国外学术的这一习惯的影响,为了寻找将黑格尔、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关联起来的突破口,我想先看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怎么做的。于是在继续阅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同时,在2005年7月,我开始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作家的著作,先后读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科尔纽、A.施密特、科西克、萨特、阿尔都塞、阿多尔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的作品。

当然,由于时间紧迫,我并没有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进行特别细致的阅读,有的人由于和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没有太大关系,只是稍微浏览而已。在这所有人中我对卢卡奇、萨特、科西克和马尔库塞尤为重视。现在回过头来看,在西马诸贤这么多人中,我只对这四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是必然的,因为我当时对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很崇拜。卢卡奇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读他的书有利于我更好地把握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把握马克思是如何突破黑格尔的思维框架的。卢卡奇告诉我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不一样。萨特和科西克是典型的海德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读他们的书让我确信借用海德格尔的思想资源去重构马克思的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可能的、有效的一种方式。而海德格尔的资源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思想,利用这些思想可以推进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生存论维度的揭示,一旦有了这个维度,可以克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空场”,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而马尔库塞身上既有黑格尔的影子,又有海德格尔的影子。他所做的有关海德格尔与黑格尔的比较极具启发意义,这有利于我更自觉地走向海德格尔,更自觉地告别黑格尔。我当时觉得告别黑格尔是一件很艰难又很有意义的思想事业。所以,读马尔库塞的著作也让我很兴奋。曾经一度想直接做研究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的博士论文,但是后来还是放弃了。原因是当时在国内几乎找不到一篇专门研究《辩证理性批判》的文献,而当时我的英文也不太好,更看不懂法文,没有任何外

文资料的凭借,孤身去研究这一晦涩的文本,这在理论上是很冒风险的。不过现在想来,近十年过去了,国内依然没有出现研究《辩证理性批判》的专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界的一种遗憾。借此机会,我郑重呼吁,那些法文基础比较好的学者尽快去研究萨特的这本书,因为它很有价值。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只有深入理解了《辩证理性批判》,才能更好地理解《时间与实践》的第四章,这是后话。

通过对以上四人的作品的细致阅读,我感觉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更加具体和清晰了,聚焦点应该是在实践概念上,既要讨论马克思的实践原则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差别,又要讨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中潜在的生存论维度。但是,当时我对生存论与超验论之间的差别体会不是太深,认为二者都是思辨的,可以将以生存论的实践概念为中心的学说看成是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但是,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对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否是新颖的东西呢?我当时心里没底,长期以来,我只关注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人物的思想,几乎没有涉足国内的马哲研究,不了解国内马哲界都在做什么工作。

为了弥补这个缺环,也为了使自己的选题更具有针对性,在我完全确定自己的选题之前,我还有选择性地阅读了吉大马哲领域诸位老师的代表论著。另外我还特别看了张汝伦老师的《历史与实践》、俞吾金老师的《实践诠释学》、吴晓明老师有关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和形而上学没落方面的论著以及邓晓芒老师的有关实践唯物主义的现象学维度的论文,也读了徐长福老师讨论实践哲学的代表性论文^①。在这些阅读的基础上,我确立了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针对性,那就是通过梳理实践概念的三个层次,明确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实践概念的三重遮蔽,从而凸显实践概念的思辨意义,形成一种有关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新的理解和解释模式。我大约是在2006年3月中旬确立了这一具体的思路,在经过三次修改开题报告之后,大约在2006年5月完成了开题报告。到此为止,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和具体的提纲都确立下来。这篇论文将马克思放到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去考察,特别区分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同黑格尔实践哲学的根本差别,在此基础上,利用海德格尔的学术资源去展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思辨维度,并在此基

^① 坦率地说,就这些储备,还是很不够的,我心里依然没底。但是,当时我的生存压力很大,不仅父母的问题没有解决,自己还结了婚,不尽快找到工作,怎么养家糊口?自己既是原来那个大家的希望,又是现在这个小家的顶梁柱,怎能不着急?还好,2007年之后,我通过努力,基本上弥补了这个遗憾,实现了对国内实践哲学研究的全面跟踪,在此次修改论文的过程中,也将这种跟踪的新成果放入到本书中,使本书在这方面显得更加丰满。

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共产主义学说。由于我力图彰显的是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思辨维度,而且我所使用的基本工具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思想,所以,我将此论文定名为《时间与实践——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导论》。2007年1月15日,经过三个半月的写作,我完成了论文的初稿。

此后的七年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对这篇博士论文进行修改。在这过去的七年间,我主要做了四件事情:一是更加系统地阅读了国内马哲学界最近二十年来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了解了当代马哲界主要的研究机构和代表人物所做的理论贡献^①,为我初步介入学术讨论打下基础。二是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对马克思经典名著的细致解读,从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开始,一直讲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其中用功最勤的是《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博士论文》讲过两遍,学生整理的笔记有8万多字。《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虽然只讲了一遍,但是却花了我整整四个学期才讲完,学生整理笔记有20多万字。《共产党宣言》讲了六遍,学生整理的笔记也有10万字左右。应该说,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要远远强于2007年。三是一直坚持对黑格尔的《小逻辑》《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三本书的句读解读,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生整理的笔记有200多万字。这些成果将在未来的几年陆续出版。我对黑格尔的理解程度又深化了很多。本来这次修改博士论文的时候,关于黑格尔那一部分想重写,但是,考虑到一旦重写,前后部分都得大改,这样将使整个论文失去连贯性,于是,那一部分除了加入一些新的注释之外,并没有太多改变。我做的第四件事是深化了对实践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元实践学的研究。近七年来,我一直在跟踪国内实践哲学的发展,特别是徐长福的异质性哲学、杨国荣的实践智慧研究、王南湜的实践智慧概念、韩潮和朱清华的实践哲学研究以及丁立群的某些成果。通过这种跟踪,我提出了元实践学发展的三种典型形态的理论,基于这种理论,我发现我的博士论文的导论部分犯了一个错误:我没有将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同超验论的元实践学区分开来,将对实践概念的时间性分析和历史性分析界定为“思辨的实践

^① 参看拙文《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四大重镇风格和实力对比》《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七小虎”风格与实力对比》《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谱系的几点补充说明》和《关于增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作为哲学三级学科的建议》,这四篇文章在网上发表后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但是,在我看来,我是以学术史的方式力图客观公正地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对每一个学派和代表人物我都饱含敬意。经过那一段时间认真的清理之后,我觉得自己基本上弄清楚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参与具体的哲学讨论了。

哲学”这是错误的,因为在经典意义上使用“思辨的”这一术语,容易让人想起超验论的形而上学,而“思辨的实践哲学”容易被人理解为一种超验论的元实践学。但是,事实上,即使在博士论文时期,我也是将海德格尔同黑格尔区分开来看待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同超验论的元实践学区分的自觉。

正是由于以上的考虑,这次我把博士论文凡是出现“实践概念的思辨意义”或者“思辨的实践概念”的地方都改成“实践概念的形上意义”或者“形上的实践概念”这种较为宽泛的词。因为形上的实践概念既包括超验论的实践概念和分析的实践概念,又包括生存论的实践概念。而本书的主题讨论的是生存论的实践概念以及建立在此概念基础上的生存论的元实践学。于是,本书的副标题就由原来的“一种思辨的实践哲学导论”改为“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书中的具体内容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经过这种调整之后,正式出版的这本《时间与实践》的主题就更加明确了:不是普遍地讨论实践概念的思辨内涵,而只讨论实践概念的生存论内涵;不是一般意义的讨论“思辨的实践哲学”,而只是讨论“思辨的实践哲学”中的一种,即生存论的元实践学,超验论的元实践学和分析的元实践学不是讨论的主题。

三、谢 词

我要感谢的人很多。

我要感谢我的父亲黄发鹏先生和母亲李怀金女士,他们不仅给予我生命,还塑造了我最初的性格。他们的开明使我可以走上哲学这条路,他们在困难中的坚韧使我有信心坚持对哲学的学习。另外,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奶奶和幺姑,她们对我不计回报的爱让我体会到人间的温暖和伦理共同体的重要。

我要感谢吉林大学哲学系的诸位老师,尤其是福森师、利天师、正律师、文新师、大志师、天成师、连朋师、天俊师,还有我的良师益友韩志伟和张以明。他们不仅给我打开了一扇扇美丽的哲学大门,让我登堂入室,而且,在生活上也给我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我体会到一种古典的师徒之情,一种家庭般的温暖。感谢我在吉大的同学、老乡和朋友,你们是我生命中珍贵的财富。

我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诸位同事,特别是邓晓芒教授、张廷国教授、高秉江教授、李耀南教授、董尚文教授,雷瑞鹏副教授、唐琳副教授、张建华博士、闻骏博士、吕晓雪女士和邹维瑁女士,他们要么在学问上给我启

发和推进,要么在生活上给我以无私的帮助。在华科工作那几年,我也感受到一种家的温馨。虽然因为体制的原因,我不得不离开华科哲学系,但是我会永远铭记他们对我的友爱和帮助,永远为他们祝福。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华科的那些优秀的学生,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漫步东湖和森林公园,成为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

我要感谢吉林大学的贺来教授、贾中海教授、罗克全教授、吴宏政教授和白刚教授,辽宁大学的陆杰荣教授和王国坛教授,黑龙江大学的樊志辉教授、王国有教授和蒋红雨教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漆思教授,复旦大学的邹诗鹏教授,南京大学的刘怀玉教授、胡大平教授、张亮教授和蓝江教授,北京大学的杨学功教授和聂锦芳教授,中山大学的刘森林教授和徐长福教授,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有信心。

我要感谢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领导,他们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尽量减轻我的工作量以便有闲暇做学术研究。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和西南大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所的资金支持,对这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致以谢意。同时也要感谢西南大学社科处郑处长和吕刚武老师的大力支持,在我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和结题过程中,他们为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委领导的支持,没有这个基金的支持,本书不可能以如此优美的形式展示给读者。

我还要感谢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一部崔继新主任和孔欢编辑,是他们的努力推动和辛勤劳作,使这本书能够以较好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他们对学术的热情和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蒋志红女士。2005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一无所有。这么多年,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给我以支持和鼓励,吃了不少苦。我的博士论文的初稿和另外三本书都是她帮我打印和校对的。我之所以能够全力工作,是因为她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另外,我也要感谢我的孩子黄宁致。她是上天给我的珍宝,不管我有多累,一见到她我就有了力量。就在我写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她还在我身边,安安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尽量不打扰我。她在我生命中的分量和哲学一样重要。

黃其洪

2016年4月6日

西南大学文化村六舍219室

目 录

自序	黃其洪 1
导论 为什么实践哲学也可以是形上的	1
一、实践概念的含义辨析	2
二、实践、实践哲学与元实践学的关系	13
三、分析的、生存论的和超验的元实践学	23
四、经验的实践概念与物质本体论的内在关联	28
五、道德的实践概念与解放哲学的内在关联	32
六、生存论的元实践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视域	41
第一章 生存论的元实践学的方法论反思	48
第一节 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自身完满性	48
一、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对象	49
二、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动力	51
三、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体系	54
四、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和开端和终结	57
五、黑格尔思辨辩证法对现代哲学的回应	60
第二节 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解构	67
一、“感性确定性”中感性原则的丧失	67
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的历史性的虚假	70
三、精神中介活动缘发构域的隐没	72
四、缘发构域的缺乏导致对存在的遗忘	75
五、对存在的遗忘与“世界图像时代”的内在关联	77
六、对存在的遗忘与虚无主义的本质相关性	80
七、对存在的遗忘与解放议程的内在矛盾	82
第三节 生存论的元实践学的方法论平台	83
一、哲学既要反对“也”，也要反对“和”	84